



# 连拾两对金耳环 下关车站遍地黄金?

上世纪30年代,正值南京下关车站的黄金期,南来北往的客人每天穿梭于此,热闹非凡。人多了,难免就会有人丢三落四。不过,有位“幸运”的巡警,却短短几天内,在下关车站连拾两对金耳环。他的手气真有这么好?或者说下关车站“遍地黄金”,捡到金耳环稀松平常?让我们来看看1931年3月8日,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上的这篇搞笑旧闻。

▶1931年3月8日,《中央日报》报道了3月7日发生的这起诈骗案

## 事发惠民桥 当铺伙计指控警察是骗子

1931年3月7日,惠民桥附近的一个治安警亭,受理了一起欺诈纠纷。纠纷的两位主角,一个叫陈广兴,三十四岁,江宁人,是附近同济当铺的伙计;另一个名叫郭传凤,三十一岁,六合人,自称是栖霞山江宁县公安第一分局第一分驻所的巡长。

按照常理,人们会认为,一定是伙计陈广兴做了什么坏事,被警察郭传凤扭送到了治安警亭。然而,事实恰好相反,是伙计陈广兴把警察郭传凤一路扭送到了治安警亭,还口口声声说郭传凤是个大骗子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

治安警厅的警察名叫王炳成,他简单问了几句,但是却越问越糊涂。因为陈广兴和郭传凤,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两人争执不下。于是,王炳成只好把他们带到了下关第四分驻所,交给自己的上级、一位姓孟的巡官来调查此事。

孟巡官会调查出什么情况呢?

## 争端起于假金耳环 大胆“骗子”六天两次来当铺

1937年3月8日,也就是事情发生后的第一天,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以《金耳环两对赴当铺典质,店伙认出是假的》为题,详细报道了孟巡官调查的经过。

在调查中,同济当铺的伙计陈广兴义愤填膺,详细讲述了自己的遭遇。

3月7日这天,正值陈广兴当班,店里来了一位客人,说手头有一对金耳环,因为急用钱,想先典当了。见生意来了,陈广兴自然高兴。不过,经验老道的陈广兴仔细一看这对金耳环,却高兴不起来了。因为,这根本就是一对假金耳环。事情到这里,本可以了结,客人可以带着假耳环走人,当铺伙计则继续等候客人光临。谁知,店里的另一个伙计夏慕川,见到这位拿假金耳环的客人后,立刻大叫骗子。原来,就在六天前,也就是3月1日,这位客人也光临了同济当铺,而且手里拿的也是一对金耳环。最气人的是,那对金耳环也是假的。

3月1日当天,接待这位客人的伙计,就是夏慕川。夏慕川因为经验不足,当时并没有辨别出金耳环是假的,兴高采烈地留下了耳环,给了客人七元三角大洋。

七元三角大洋是个什么概念呢?根据陈明远的《文化人的经济生活》一书记载,1929年,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,每块银元可以兑换两三百个铜板,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



鸡蛋。如此算来,夏慕川交出去的这七元三角大洋,可以买到少则700多个、多则2000多个鸡蛋。如此一笔“大钱”,差不多赔上小伙计整月的收入了。这怎能叫夏慕川不心疼?所以,看到骗子居然用同样的伎俩再次来戏耍同事,他真是怒火中烧。

于是,在愤怒的声讨声中,陈广兴就一路将骗子扭送到了治安警亭。不用说,这位骗子正是自称为警察巡长的郭传凤。

## 假金耳环来历不明 骗子说是下关车站捡的

见陈广兴愤怒地指责自己,还当场掏出了两对假金耳环,郭传凤有点慌了。不过,面对孟巡官的查问,他很快镇定下来,为自己辩护。

郭传凤说,3月7日当天,他的确拿着一对金耳环去了同济当铺。不过,这对金耳环,原本并不是他的,而是他四五天前在下关火车站捡的。最近,他手头缺钱,于是把耳环拿来典当。耳环到底是不是金的,他确实分辨不出真假。至于说他3月1日曾带着假金耳环去当铺的事情,郭传凤矢口否认,说那个人根本不是他。

3月1日那天,郭传凤到底有没有去过同济当铺呢?他说自己是警察,到底是真是假呢?报道称:“盘诘再三,各执一词,旋乃一并解送第十一局,转厅法办云。”

虽然,1931年3月8日的《中央日报》,并没有交代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。但是从当天的报道看得出,郭传凤十有八九是在说谎。狡猾的他虽然一口否认3月1日曾经来过同济当铺,但是作为一名警察,他捡到别人失落的财物后,为何不上交,而要落入私囊?他工作的地方在栖霞山一带,可是他为何会在下关车站捡到金耳环?捡到了金耳环四五天后,他为何不就近找个当铺当掉,而要绕个大弯,再次回到下关来当?

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!

## »相关链接

南京下关车站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是南京的第一座火车站,在建站伊始即被命名为南京站,但南京人却一直喜欢称其为下关车站。100年前,这里是按当时统一规格“一等站屋”设计,有大小平房18间,建筑面积520平方米。1930年,国民政府铁道部对车站进行重建。重建的车站站屋为中间3层、两侧2层的建筑。站屋中部为椭圆形车站大厅。一九六八年底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后,南京新客站落成并被命名为南京站,下关车站更名为南京西站。



民国时期的南京下关车站 资料图片

# 澡堂老板遭遇“寒冬” 擦背捏脚收入却不错

随着南京城建脚步的加快,许多颇具年代的老澡堂正在渐渐消失。那些雾气缭绕的老澡堂,让老南京人割舍不下。从前的澡堂什么样子?都成渐行渐远的模糊记忆了。有趣的是,75年前的今天,也就是1936年3月7日,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记者经过长时间的调查采访,写成了一篇有关当时南京洗浴行业的报道,翻开这篇报道,老澡堂的风光近在咫尺。

▶位于中华路和建康路交叉路口的三新池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浴室 资料图片

## 澡堂生意火爆 大小老板赚得眉开眼笑

1936年3月8日、3月9日,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连续两天登出名为《南京的浴室业》报道。仔细分析了南京洗浴行业的情况。

据报道,当时的中国,因为经济落后,普通家庭的住房,很少有带浴室的。因此,公共的澡堂在那时非常盛行,不过,即便盛行,南京的公共澡堂,在1925年前后,全市也不到四十家。这一时期的公共澡堂,条件实在不怎么样。据《中央日报》描述,浴室有两种,“一种是盆汤浴室,开设的成本,少则八千一万,多则四五万元。它里边分作几种等级,有瓷盆石盆大池的分设,浴资当然是随着等级而分高低。”不过,“到大池里洗澡的人,不一定是下级社会的人,有因兴之所好,喜欢在大池里洗澡的。”

另一种则是温堂,“这温堂单有一种大池,没有盆浴的开设成本,只需一千元,在这里洗澡的人,纯粹是下级社会的人。”这种大池,美其名曰“大”,但实际上,面积不过两三方丈大小,深度不过二尺多。里面放上几十担的热水,在一间四面不透气的屋子里,一天到晚,不知要经过多少人洗浴,其肮脏的程度可想而知。

尽管澡堂的卫生条件欠佳,但客人还是络绎不绝,“营业非常旺盛,每日可做到二三百元的生意。即小规模,也可有五六十元的生意。”

这种容易来钱的生意,让老板眉开眼笑。不过,好景不长,澡堂老板们的“寒冬”就来了。

## 人口暴增生意却下滑 只因新来的人不爱泡澡堂

由于澡堂的生意好做,精明的生意人开始一窝蜂开澡堂,根据《中央日报》的记载,到了1936年,南京城里的澡堂一下子增加到80多家。这些新增加的澡堂,老板加大投入,硬件比过去好了。可奇怪的是,老板们的收入却急剧下滑,只有十年前的一半了,“规模较大的浴室,每日的收入,至多也不过一二百元,其次的可以想见了。”

为什么澡堂的收入会下降呢?《发现》周刊带着好奇心寻找答案。民国时期《首都计划》提供的人口数据,让记者眼前一亮。1925年,南京共有人口395900人,而当时的澡堂子不到40个,这也就意味着平均大概1万个人共用一个澡堂子。那么,1936年,随着澡堂数量的增多,每家的平均顾客数量是不是大幅度减少了呢?

记者随后查阅到了1936年南京的人口数量:城区人口85万左右。这也就是意味着,1936年,南京和十年前一样,还是平均1万人左右拥有一个澡堂。可是,为什么澡堂老板的收入却大幅度下降了昵?

《首都计划》给出了答案,“参照外国



中央机关与全国人口比例,我国中央机关之职工,应达十万人之数”,“将来政治组织扩充,新增之职工,及与新增职工连带而移住者,又增十余万”。

原来,这些新增的几十万人口里,很多都是条件比较好的政府工作人员,对于那种卫生条件相对比较差的公共澡堂,他们极不愿光顾。所以,尽管十年间,城市人口数量猛增,但光临澡堂的客户,还是从前的那些阶层。顾客数量变动不大,但澡堂数量却大增,生意自然就不好做了。

## 擦背捏脚扬州人居多 机灵勤快收入还不错

虽然澡堂老板的生意不好做了,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,在澡堂里捏脚擦背的人,生意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。

据《南京的浴室业》描述,在当时的南京公共澡堂里,家家都有擦背捏脚的工人。这些人,不仅手脚勤快,嘴巴还特别能说,“恐你觉得寂寞,就会想出许多话来同你谈。”

这些人,并不是澡堂的员工,老板不给他们工资,也不供给伙食。他们全靠自己的双手赚钱,而且赚来的利润,还得抽点分子给老板,作为借用老板澡堂的代价。当时,为了方便顾客结账,擦背捏脚的费用,并不需要另外结,而是和澡资一起结。而搓澡捏脚的人,只需要跟着客人在座位上放一根竹签,等到晚间柜上结账的时候,就凭着签子的数量算钱了。

那时的公共澡堂里,除了擦背捏脚的,还有扞脚和剃须的。干这些活儿的人,“听说以扬州人为多”。他们的工作虽然极易被人轻视,不过,由于他们手脚勤快,嘴巴能说,常常让客人深觉满意,因此“或得到客人的外赏,在生涯忙的时候,一天的收入也很可观。”



1936年3月8日,《中央日报》刊登名为《南京的浴室业》的报道

## »相关链接

不久前,南京一家名叫三新池的老澡堂即将关门停业的消息,在一批老市民当中引起轰动。三新池位于中华路和建康路交叉路口,有近百年历史。随着城市的改

造,这座老浴室将在今年初夏关门。另据报道,南京的老澡堂在1985年前后有37家,这些年,有的被拆,有的经营专项,如今,老城区对老百姓开放的平价老澡堂就只5家了。

本版撰文 快报记者 白雁